

论谭恩美小说中 华裔女性身份缺失与建构

邱 畅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沈阳 110136)

[摘 要]后殖民女性主义将后殖民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结合,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女性,关怀其生存状态,鼓励其努力抗争,重新建构其自主意识和自主身份。谭恩美是华裔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其小说通过描写华裔女性在故国和异国的悲惨遭遇,表达对华裔女性的同情,努力唤醒华裔女性的自我意识,呼吁其摆脱双重边缘化的状态,着力重构自主身份。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谭恩美小说中华裔女性的身份缺失及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身份缺失;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1-0181-04

华裔文学形成之初并未进入主流文学视野,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初具规模。当时美国文坛涌现一批华裔作家,谭恩美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谭恩美的文学创作极大地推动了华裔文学的发展,使读者和文学界对华裔文学的认同度日益提高。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入手,系统分析谭恩美小说中华裔女性的身份缺失与建构,具有一定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应用性。

一、华裔女性身份的双重边缘化

在父权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双重压迫下,华裔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均遭遇双重边缘化。对于华裔女性而言,无论是在父权文化社会还是在异质文化社会,她们均缺乏主体身份,无奈地沦为依附于主体的社会存在。这里所说的主体既指在社会环境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又指在文化环境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因此华裔女性既是性别的“他者”,又是文化的“他者”,是被双重边缘化的“边缘人”。谭恩美小说中刻画的母女两代华裔女性均归属于被双重边缘化的“边缘人”。在谭恩美的小说中,华裔女性是两种文化碰撞和冲突的矛盾体。一方面,华裔女性生活在父权文化中,性别带来的歧视和偏见使其被男性边缘化;另一方面,华裔女性生活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使其被主流文化边缘化。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女性在两种文化的冲击下渐渐丧失主体身份,性别主体和文化主体的双重迷失以及缺乏归属感成为华裔女性的标志性特征。

一方面,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女性被父权文化边缘化。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是社会的主体,具有主体身份;反观女性则完全丧失话语权和主体身份,必须以男性为参照物,顺从地遵守男性和社会对女性的种种规制和要求。鉴于历史学家史考特的观点,性别既是决定两性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决定两性权力关系的因素。^[1]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等级具有明确的划分,而且男性与女性的权力关系也呈现明显的不均等结构,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边缘化为

[收稿日期]2016-07-28

[基金项目]2014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后现代叙事艺术研究”(W2014009)

[作者简介]邱畅(1980-),女,北京人,副教授,博士,从事英美文学、华裔文学研究。

“他者”。在父权制的威慑下,女性的自由权和选择权被男性肆意蹂躏和践踏,迫使女性逐渐形成逆来顺受的顺从思想和任人摆布的生活态度。

谭恩美小说中母女两代华裔女性均笼罩在父权制的阴影下,被父权制边缘化,导致身份缺失。与女儿一代相比,母亲一代往往经历过旧中国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因此她们被边缘化的程度更加深重。母亲一代对自己的命运完全失去自主权和控制权,在顺从思想的灌输下,她们被迫接受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对其施加的任意摆布和肆意安排,其中尤以包办婚姻最为典型。《喜福会》中的钟琳达和《灶神之妻》中的雯妮都是父权制威慑下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钟琳达还未成年便被送到“娃娃亲”的婆家,在婚姻中饱受折磨;雯妮被养父包办嫁给性格暴戾的军官文福,从此开始人生的噩梦,直到认识美籍华人路易才得以挣脱备受折磨的婚姻。包办婚姻对母亲一代的折磨不仅是肉体上的侵害,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母亲一代所经历的包办婚姻是华裔女性失去自主权和选择权的最佳证明,也是母亲一代因被边缘化而导致身份缺失的显著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谭恩美在小说中对包办婚姻的鞭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揭露,这一点充分表明了身为华裔作家的谭恩美也在运用东方主义的视角,从西方社会的角度定义东方,以西方人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与文化。

与母亲一代相比,虽然女儿一代的生活境遇有所改观,但是文化的传承性和浸染性仍然使女儿一代被边缘化为“他者”。女儿一代生长于美国社会,她们并没有经历过旧中国父权制社会的压迫,没有遭受包办婚姻的摧残,她们对中国的认识仅限于母亲向她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尽管女儿一代没有遭受包办婚姻的迫害,经过自由恋爱与美国丈夫开始婚姻生活,但是她们依然无法摆脱父权文化的压迫和顺从思想的束缚,仍然是依附于男性的“他者”,男性依然是社会的主体。《接骨师之女》中露丝竭力顺从美国家庭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甚至为了顺从家人的需要而完全放弃自己的需要,顺从的露丝逐渐丧失自主权和选择权,在家庭中日渐边缘化为从属地位,导致身份缺失,成为依附男人的“他者”。

另一方面,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女性被异质文化边缘化。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只是华裔女性所受压迫的因素之一,必须将种族、民族、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等因素考虑在内,从跨文化的视角关注华裔女性的生存状态,才能真正发掘华裔女性被边缘化的根源。在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下,华裔属于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其文化与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华裔女性在主流文化大行其道的美国社会被无情地边缘化。由于女性性别的劣势,她们已经在父权制社会中被男性边缘化,因此在异质文化中再度被边缘化使华裔女性的身份遭遇双重边缘化,从而导致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华裔女性面临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身份缺失。正如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莫汉蒂所指出,性别并不是解决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核心^[2],可见,华裔女性身份缺失是由华裔女性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造成的,如果这种大环境无法得到改观,华裔女性仍将面临身份缺失的尴尬境地。

在谭恩美小说中,母女两代华裔女性均面临双重边缘化下身份缺失的窘境,面临身份危机。为了摆脱婚姻的折磨,母亲一代纷纷来到美国开始新的婚姻和生活,然而她们却发现自己身在异质文化中不仅无法摆脱父权文化中“他者”的身份,反而因无法融入美国文化而再次被边缘化为异质文化的“他者”。《接骨师之女》中茹灵来到美国后不仅遭受白人的歧视,甚至还要遭受出生在美国的女儿露丝的歧视。《灶神之妻》中雯妮来到美国后渐渐融入白人文化,尽管如此,雯妮仍然无法将自己变成真正的美国人,在美国开始新的婚姻后依然无法摆脱婚姻中的性别歧视,只能在极力摆脱中国文化和努力靠近美国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同时成为两种文化的边缘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逃避并不是解决“他者”身份的途径,在一种文化中遭遇的问题,无法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解决途径。母亲一代试图通过逃离来解决自身在父权文化中遭遇的身份危机,结果只能使自身陷入更深的身份危机之中。

即使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女儿一代也难逃被异质文化边缘化的厄运。尽管在女儿一代眼中,西方社会是“我们”,中国社会却是“他者”,但是美国人眼中的女儿一代仍然是与众不同的少数族裔。由于女儿一代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非白人的身份,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相互交织使女儿一代仍然无法摆脱被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喜福会》中吴、钟、苏、圣四家的女儿均在美国出生,接受美国的教育和文化。女儿们将自己视为美国人,极力摆脱中国与自己有关的一切,甚至努力割裂自己与祖先的联系,将自己的身份从家庭背景中独立出来。她们习惯采用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拒绝接受母亲的处事原则和思维方式,坚持反对母亲对自己施加任何约束。《灶神之妻》中的珍珠甚至将母亲视为来自异质文化的“他者”,认为母亲代表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象征。女儿一代极力摆脱自己身上中国文化的印记,期待更好地融入美国文化,却遗憾地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即使她们出生在美国,仍然是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的接受度仍然较低。文化印记如同流淌在人身体里的血液,也因此注定

她们无法摆脱父权社会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其身份仍然被双重边缘化,遭遇身份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谭恩美小说中华裔女性身份的双重边缘化是其自身文化经历的真实写照。东方主义是从西方的角度定义东方^[3],从西方社会的角度来看,东方就是“他者”。作为华裔女作家,谭恩美极力维护华人身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如此,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谭恩美也不自觉地从西方的角度看待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对照的“他者”。

由于受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华裔女性的身份被双重边缘化,导致她们对自己的身份缺乏恰当的判断,甚至缺乏表达自我的能力。谭恩美小说中的母女两代华裔女性均处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下,同时又对男性及殖民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这种复杂的情绪使华裔女性在意识中充满焦虑。她们抵制异质文化,又努力融入异质文化;她们努力摆脱父权文化,又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双重困境使其无法言说,陷入沉默。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即“他者”,社会道德标准对于女性的约束十分严格,道德成为压制女性的沉重枷锁。

为了摆脱父权制的压迫,母亲一代纷纷逃往崇尚自由的美国,寻求新的生活。遗憾的是,由故国移民而来的母亲一代无法融入美国的文化环境,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和冲突使她们始终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在长期边缘化的过程中她们逐渐丧失表达能力,失去话语权。《喜福会》中莺莺嫁给美国人后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完全更改,由于失去真实的自我而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隐藏起来,从此变得沉默。《接骨师之女》中茹灵因无法用英语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很难与人沟通,日渐沉默的茹灵患上老年痴呆症,疾病使她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无法与人交流,彻底陷入失语。在双重边缘化的状态下,母亲一代陷入从无法表达达到不想表达的失语,这种失语已经不单纯折射出华裔女性的话语权被剥夺,而是进一步折射出母亲一代在长期压抑下对自我身份的一种放弃。

虽然女儿一代作为生长在美的第二代移民拥有稳定的生活,却没有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仍然因被主流文化边缘化而失去话语权。《接骨师之女》中露丝生长在美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但是这些仍然无法改变露丝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状况。在工作中,露丝帮助别人书写,永远没有机会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家庭中,她的白人丈夫始终以美国价值观与其相处,令露丝疏离感倍增。在主流文化的压迫下,女儿一代仍然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逐渐陷入无处可诉的沉默。由此可见,客观生活环境的改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上的疏离。即便女儿一代在生活上已经融入美国社会,但是在文化上她们依然是被拒之于千里之外的边缘人,依然无法掌控自身的话语权与选择权。生存的无奈和内心的孤独使女儿一代渐渐陷入失语,进而导致身份缺失。无论是历经苦难的母亲,还是在主流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女儿,两代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失语现象。

二、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

在经历双重边缘化的困境之后,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女性开始觉醒,试图摆脱自己遭遇的身份危机。一方面,她们努力打破因失去话语权而导致的失语,通过语言或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挣脱父权文化和主流文化对自身造成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不再向命运低头,顺从地听从男性或主流社会的一切安排,而是通过反抗来摆脱父权文化或主流文化对自身造成的剥削和压迫。为求争取抗争的胜利,她们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父权文化和主流文化相抗衡,争取自身的自由和独立,建构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

通过美国主流文化的浸染,华裔女性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而且日益强烈。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应该仅作为男性的“他者”和主流文化的“他者”,女性自身也应该通过努力摆脱来自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压迫,确立自我意识,建构自我身份。面对自身所处的困境,她们不再沉默与忍让,而是开始寻求自身的独立与解放,摆脱沉默的状态,大胆地表达自我的思想和感受。美国华裔女性的勇敢“发声”不仅强烈批判自己在父权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双重压迫下的苦难历史,而且极力纠正父权文化及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女性的误解。在挑战父权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权威性的同时,华裔女性极力摆脱双重压迫,改变自身被双重边缘化的状态,重新掌握话语权,建构一个以女性为主导地位的全新世界。华裔女性的失语表明其无法构建自己的身份,也无法形成自我意识,因此华裔女性重新“发声”是实现其身份构建的主要途径。

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需要经历从“失语”到“发声”的过程。谭恩美小说深刻关怀被双重边缘化的华裔女性,鼓励华裔女性建构自己的语言系统,重构自己的话语权。在《喜福会》中,母亲们在长久的压迫下已经习惯沉默,她们不敢寻求自我意识,害怕遭遇失败,只能在沉默中将希望寄托于女儿。母亲一

代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虽然母亲希望女儿融入美国文化,希望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在女儿身上得以实现,但是母亲仍然希望女儿不要割断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反观女儿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阻碍自己融入美国文化的障碍,希望彻底摆脱中国文化。尽管母亲试图约束女儿的想法,然而女儿努力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不断反抗母亲,以此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反抗。显然,对于反抗美国主流文化的压迫,母女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母女双方则意见相左。母女双方对主流文化的意见分歧充分反映华裔女性对待主流文化的矛盾心理,同时也昭示华裔女性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心理阻碍。值得注意的是,母亲对女儿这种畸形的期望往往对女儿造成巨大压力,不仅造成母女关系的疏离,而且造成女儿的沉默。单纯依靠女儿的“发声”并不能解决母女两代人的问题,只有母亲树立自我意识,争取独立和自由,通过自身的努力反抗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压迫,调整双重压迫下产生的畸形心理,母女之间的沉默才能打破,母女两代人才能真正经历从沉默到“发声”的过程。

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需要经历从顺从到抗争的过程。在父权主义的压迫下,大部分华裔女性的抗争是长期压抑下的爆发。在谭恩美小说中,母女两代华裔女性都在为改变命运而抗争,只是由于社会背景和生活境遇的差异,抗争的目的和手段有所差别。在《灶神之妻》中,雯妮顺从地接受父亲的包办婚姻。尽管雯妮受尽丈夫的折磨,依然极力忍受,直至丈夫痛打不到一岁的孩子才使雯妮彻底觉醒,意识到自己应该为自己的命运抗争。雯妮为追求幸福而反抗,将残暴的丈夫告上法庭,逃离包办婚姻,探寻自己的独立意识,建构自己的自主身份。长期的顺从使华裔女性的抗争之路异常艰辛,有些华裔女性甚至选择以生命抗争。在《接骨师之女》中,宝姨和茹灵都选择以生命抗争。当宝姨得知自己的女儿将被嫁给仇人的儿子时,她以生命相抗衡。宝姨死后,茹灵得以保全,没有嫁给仇人的儿子。当茹灵与露丝发生激烈的争吵时,茹灵采取与母亲相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以跳海相逼,使女儿顺从自己的心意。宝姨和茹灵的极端表现充分表达了华裔女性在面对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压迫时愿意付出一切与之抗争的决心。一旦华裔女性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身份缺失,其生命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在经历长期的压迫之后,华裔女性必然产生一种抗争的冲动,华裔女性由顺从到抗争的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只有通过抗争,华裔女性才能真正摆脱身份缺失的状态,走出身份危机,建构自我身份。

华裔女性在失去话语权的同时,也丧失自己的主体身份。在重新建构身份的努力中,华裔女性必须同时建构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以此摆脱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压迫,摆脱失语状态。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女性在面对双重压迫的困境时,不会挑战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权威,只会选择沉默和忍受。只有鼓励华裔女性拿回自己的话语权,改变沉默的状态,华裔女性才能真正发出反抗的声音,形成摧毁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主体意识。谭恩美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细腻地刻画华裔女性的情感变化和反抗声音,彻底颠覆父权制社会和美国主流文化社会,恢复华裔女性缺失的身份。

总之,后殖民女性主义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有机结合,弥补二者在关注视角上的空白,将目光投向一直被忽略的第三世界女性。第三世界女性既受到父权主义的压迫,又受到主流文化的压迫。在父权主义下,第三世界女性是性别的“他者”,是男性的附属品;在主流文化中,第三世界女性是主流文化的“他者”,是主流文化的附属品。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下,第三世界女性被双重边缘化,缺乏自主意识和自主身份。后殖民女性主义恰好迎合华裔女性的诉求,只有同时反抗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剥削,才能真正建构华裔女性的自主身份。

[参 考 文 献]

- [1]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5.
- [2] Mohanty C T. Under Western Eye: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93.
-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

(责任编辑:曹金钟 孙琦)